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程显辉 日期：2024年5月14日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程显辉 导师签名：刘天路 日期：2024年5月14日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来华基督教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却一直没有给予较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从一个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即对来华基督教的直接成果——基督教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做初步的探讨。

来华基督教对近代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把西方的政治理论传播到中国；他们还通过开办学校、翻译西书、创办报刊等活动，把基督教和西方社会的具有近代色彩的科学知识、价值理念等传播到中国，使中国人开始了求新、求变的历程。基督教会的这些活动构成了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挑战，诱发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摆脱愚昧、落后状况的愿望，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发生和高涨准备了舆论环境。

在最先有基督教会活动的广东和香港两地，在基督宗教和基督教会活动的影响下，部分中国基督教徒基于救亡和建立文明国家的信念，投身到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中，成为参与辛亥革命运动的特殊群体，在革命中起了领导和骨干的作用；他们以各种形式投入到革命中，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做出了贡献。

在近代中国，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作为外来社会力量的基督教会，它们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歧异与趋同、冲突与调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与互相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渐趋深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辛亥革命 革命教徒 救国 贡献

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Chinese history, study of it already is not a new subject, but relationship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ill is a subject needs further research .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question that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Christian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rom a side way.

Christian missions in modern china criticize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introduce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opened Christian education, translated western books, published 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so on. these series of social activities had greatly influenced on the growth of modern china.

Guang Dong and Hong Kong where Christian missions had entered earlier than other cities in modern china, some Chinese Christians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they were leader and very important people and greatly contribution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s for from outside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in modern china, they had conflicted and allevi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at had propelled modern China the growth.

With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oming into deep,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ing frequently, it is of great use for reference to research how to intellectually treat the culture exchange and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by all circles of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atriotic Christians
 saving nation contribution

基督教徒与辛亥革命¹

引言

来华基督教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在华的活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有关基督教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综观整个研究成果，对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间接成果研究的深入、系统，而对于它在华活动的直接成果——中国基督教徒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在仅有的几篇文章中也仅限于对知名教徒——孙中山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基督教徒——这一近代史上的特殊群体，对它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本文拟从中国基督教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一个侧面，来反映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拟从基督教对近代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在最先有基督教活动的广东和香港两地，部分中国基督教徒投身于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以及教徒在革命中的贡献等三个发面来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一、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一）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炮舰和廉价的商品涌入古老的中华帝国。他们企图把上帝的福音撒遍神州大地，以基督教为武器来征服中国。然而传教士们一踏上这个古老的国家，就发现在这个古老的、曾文明于世的国度里，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愚昧现象，他们抱着“基督教化中国”的目的，对此展开了切实的批判。结合本文论题，在此重点论述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¹ 本文的“辛亥革命”不是专指1911年革命，而是广义上的“辛亥革命”

他们声称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中国之主，终身在位，是为一世”、“中国之主，出于一氏，世世承袭，乃家也”、“中国之主专制独断，故曰君主”、“中国之主，主权属诸一人，以土地人民为其产业，故谓之大皇帝”¹，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导致现今的中国是“丧师割地，而貽笑于邻邦”²。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人们被“关其口而夺其气”，“一若军国大事，断不许草野平章者，何与？”³如今的中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⁴，为今之计只能是“合四百兆人为一心，一十八省为一家”⁵。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马上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改革政体、兴办工商业，否则“不然它国未施其瓜分之毒，而华人自分之矣”⁶。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称，中国官场腐败，官吏“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必先自肥”、官吏权利膨胀，人民无自主之权，“一切大权，悉操诸官，民则皆唯唯诺诺之应声虫而已”、“发号施令，假公济私”、“防民之口，不许腾其口，说其不能忍者，则指为讪谤”⁷、“君民相隔，上下不通”，等等……。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则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称中国的“京官或省官皆不过承宣谕旨，为皇帝代理地方而已”，而美国则“各邦管理本邦庶务”；中国的皇帝系“世世承袭”，美国的总统为“人民所公举”、“四年一易”；中国的民众若“议国政之优劣，论官长之贤否者，以叛论，即有不平亦敢怒不敢言”，而美国的人民“可以议国政之优劣，可以论官长之贤否”；在国家律法上，美国是“凡国中一切律例要事，均由其（立法院）随时的定”，而“中国之大清律例，永无更改也。”

他们指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中国政治腐败，人心涣散，而中国民穷财困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好古而恶新”，所以应寻求“变通”之举，“借（西）法兴利除弊”，⁸传教士称欧美之所以能进化如此，皆源于“排政治之专制，……，复

¹ 李佳白：《中美政治异同考》，见《万国公报》，第169卷

² 林乐知：《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见《万国公报》第83册

³ 林乐知：《君民一体说》，见《万国公报》第127册

⁴ 林乐知：《险语对》，见《万国公报》第82册

⁵ 林乐知：《君民一体说》，见《万国公报》第127册

⁶ 林乐知：《君民一体说》，见《万国公报》第127册

⁷ 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治安新策”初编，第8卷，第21—22页，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⁸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295页

得其人生固有之权利，久为暴君所攘夺者，即平等自由之权利也。”¹

传教士在针砭中国官场腐败、政治落后的同时，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多有介绍，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政治理论的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他在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国志略》，（初版于1838年；1844年再版，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1861年第三版，定名为《联邦志略》）他说本书的宗旨是“传播美国的文明教化，以打破中国的闭塞无知”²，该书用大量篇幅介绍美国政治制度的完备、礼乐教化的文明、商业活动的繁盛，目的就是证明美国并非中国人眼中的“化外之邦”，而是一个在基督教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繁荣富庶的强大国家，该书首次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给正在寻求自强御辱之策的中国人以启迪。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普选制，进行了介绍，并说选举制的优越性在于“能上下无所隔阂”³。称“士农工商皆有公举人员之位分”⁴，“（议院中）如有百姓所不惬于心者，可以另择公正诚实之人以理院事，或拣送二、三人入院参议”，“所送之人若有大谬，仍当遴选他人而易之也”。⁵

20世纪初，以传教士李佳白的长文《列国政治异同考》为代表，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万国公报》，开始了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详细介绍（此文把中、美、英、日、俄、德、法等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两两进行比较，比较的范围包括土地人民之异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异同、国主之异同、议院之异同、民权之异同等）。通过这些文章，人们能比较准确地了解西方各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异同。

在《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会议堂解》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并对这一制度的主要纲目进行了分析介绍，称：“约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权，二曰掌律，三曰议法”，行权者的职能是“皆照章程中已定之法，及会议堂议定之事办理也，其所办理者，凡钱粮出入、国库开销，以及简派督兵官职，提调水陆兵丁，与邻国往来立约等事而已。”掌律者

¹ 林乐知，任保罗：《欧美十八周进化纪略》，《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第682页

²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³ 《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9册，第5361页，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⁴ 《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3册，第1083页，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⁵ 《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第9册，第5361页，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的职能是“凡清厘案牒、分给家产、判断债务,不为朝廷所拘,不受公议堂所制,且可解说律法于国皇之前也。”议法者的职能是“总理国中一切律例,听其酌议。凡增减钱粮、筹画国用是也。”作者认为三权分立的合理性在于“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其中之最要者言之,不过分行权柄而已。其权柄之所必分者,欲行之有利而不相悖,有益而不相害耳。”¹

同时林乐知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也进行了介绍,在《欧美十八周进化纪略》一文中,他详细的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丹(伏尔泰)、卢梭(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思想:“或云,天赋人权,贵贱平等,无论何人皆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自主之福。国也者,合众人之平等自主而共保此权与福也。在上位之人,当使人人得保其平等自主,而不为他人所妨碍,或僭夺也。”“或云律法者,皆循事物自然之理而设,即所以保护各人平等自主之权者也。律法未著之前早其于人之心中,即所谓良知也,律法既定之后,为全国人民所当守,故必合全国人之见而定也。律法之在人,皆为平等,君与民皆在律法之下,立法之人即为守法之人也。”“或云,上至政府之首领,下至传宣之末秩,皆为公众之用人,受人之托,以治人之事者也。凡选官皆当随其才器而公举之,不可有门户之分。”“或云,自由之权,人固有之,发之于心则为思想自由,笔之于书则为著述自由,宣之于口则为言论自由,寄之于道则为信仰自由,皆自由之权所在也,有国者不得禁之。”²《万国公报》还连载了由英国思想家施本思著、马林翻译的《自由篇》:“自由乃人天生之权利,人得自由实天下之公理,万世之常理”。声称自由与人的生命同等重要,“人之一生,无不以各得性命为正,而其要即在于自由,不与人自由,即不与人养生立命,其去戕人性命有几何哉!”;同时作者也说明自由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人欲自由,当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并进一步界定了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法律为自由之根基,无法律既无行政上自由权利”,“但法律过于繁多严切,亦足以失自由之本意,故真实之自由,与公平之法律,不能不并行而互用也。”³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兴趣主要集中于中西方人种学上的差异和坏人心术的异风陋俗与奇技淫巧,认为除此之外不值一提,四方蛮夷向化中

¹ 林乐知:《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见《万国公报》,第340卷

² 林乐知:《欧美十八周进化纪略》,见《万国公报》,第188册,

³ 林乐知:《美国治法原理》

朝的自大心理和夷夏大防的陈腐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基督教展示给中国人的却是一个富庶发达的西方。这表明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合理存在，在中国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文明教化并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是给昏睡千年的“天朝上国”提出了挑战，而天朝尽善尽美的神话一旦被打破，继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封建制度的怀疑甚至是反抗了。

传教士除批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外，还写了许多针对中国时局的文章，如广学会馆主林乐知写的《强国利民略论》（全文刊载在 392 卷至 394 卷、417 卷至 420 卷、425 卷）、李题摩太写的《救民必立新法》（刊载在 407 卷）、李佳白写的《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刊载在 97 册）……，等等，这些文章可以说给当时正处在亡国灭种危机中的中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当时许多救国心切的人士都深受其影响，关于这发面的研究，已有许多专门的论述，在此不再累举。

但是由于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的截然对立，所以直至戊戌变法前后，基督教会对西方的政治理论一直讳莫如深，然而中国现状的急剧恶化，使中国社会改革势在必行，所以基督教会一直未明确表露的立场也日渐明了，他们不断地对中国社会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鼓舞清政府以西方为榜样进行变革，对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中国是否应放弃君主专制则一直很谨慎，对于这一涉及皇权存废的敏感问题，基督教会不想开罪于清政府，因而讳言这一问题。但事态的发展却不是受基督教会约束的，在他们在华活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志士走上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道路。

（二）来华基督教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教育：针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来华基督教提出了在中国开设新式学校的主张。在中国，从传统上讲，历代的教育均由各朝政府把持，所教授的多为三纲五常、君臣之道，是为统治者稳固封建统治、选拔忠君顺从的官吏体制服务的。在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前，广大士人及普通百姓从未接触过除此以外的其它学说。传教士的到来，改变了中国人封闭、自大的思想面貌，传播了许多全新的思想学说，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对这一问题已有许多可参见的学术研究成果。

译书：除兴办教会学校外，来华基督教还翻译西方的书籍，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还广泛地宣传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刊行的西方史志类的译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国际交往惯例等，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在西学的影响下，摆脱传统的桎梏，睁眼看世界，从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知识阶层的心声。如，基督教会对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介绍，对于鸦片战争以后，极少数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的官绅，具有相当的影响。林则徐为探析西洋情报，专门组织人从事翻译事业，任事者有袁德辉、梁进德、亨德（均为教会学校学生）和传教士伯驾等，可以说林则徐对西方的认知多来自于基督教人士；王韬 1848 年到上海，访问了新教传教士麦都思和墨海书馆，次年夏到墨海书馆参加翻译编校工作，曾与传教士一起翻译了《格致西学提纲》、《泰西著述考》等书，1874 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呼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向西方学习；康有为曾说：“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置”；1885 年出版了由傅兰雅翻译的《佐治刍言》，全书以西方自由、平等理念为基点，分别从国政、法律等方面介绍西方社会立身处事之道，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由之权，国家应以民为本，政治应以民意为宗旨；而在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传教士的译著。

传教士翻译的西书，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使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加深了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的感知；另一方面则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国人追求和西方一样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要求。

伴随着新的思想、新的信息的传入，在陈腐的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突出的是社会心理机制的更新，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政治气候，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民主革命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报刊：创办报刊也是近代来华基督教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们创办的报刊，不仅在近代中国开辟了可以自由办报的先河，而且也向中国人传递了言论自由的思想，为当时禁闭的封建中国注入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观点。

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起始于唐朝，是政府的机关报。邸报只在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庶民百姓是看不到的。唐朝以来的历代王朝都严禁邸报以外的任何报纸出版...

步入近代以来，从 1815 年到 19 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 200 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 80% 以上。¹1815 年 8 月 5 日，马礼逊在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了一份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刊物虽然由教会和传教士主办，虽然留有“宗教”这一栏目，但并不是以宗教为主，而是标榜以传播新学为己任，这是第一部以中国人为对象的近代中文报刊。²据统计，在 1877 年教会刊物有七种，至 1890 年增至十三种。1895 年，李题摩太根据调查结果说，在华中文刊物“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七十六报中，十之六系教会报”³。在众多报刊中，以广学会在上海的机关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先后出版近 40 年，累计出版近 1000 期，在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是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 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于上海，目的是为了宣传基督教。它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基督教的同时，还以大量介绍西学和评论时事为时人所注目，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 and 了解时事的重要媒体。1883 年后一度停刊，1889 年复刊后成为当时在华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机关报，一直发行到 1907 年。）《万国公报》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传播的西学更是相当广泛，涉及到自然科学、天文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近代报刊所承载的无论是被中国统治阶级斥为“异端”的基督教，还是冲击封建文化的“西学”，或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各国消息，实际上都已超出了封建政权允许的范围，使中国的一些人深受影响，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引用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东西洋每月统计传》达 26 次；郑观应在 1860 年起到傅兰雅创办的英华书馆学习，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

¹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 页

²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 页

³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1954 年版，第 65—67 页

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他所提及的“达人哲士”当是指传教士李题摩太、傅兰雅等，郑观应说：“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¹；曾参加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基督教徒黄乃裳说：“泰西要着，首重议院，次即报馆”，“报馆之权亚於议院”，“故泰西举事最得风气之先，即广设报馆之力也。”²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把西学视为民族复兴和祖国富强的精神武器。《THE CHINESE RECORDER》评论说：“中国人对满洲的仇恨是由报纸挑起的”³。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介绍，一向闭目塞听的中国士人可能还会沉迷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传教士报刊介绍西学的用意如何，也无论它介绍的西学是多么地浅薄，但在引进西学方面，它的功劳是卓著的。

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途径是通过传播西学知识，营造有利于变革的舆论环境。在华基督教通过兴办学校、翻译西书、创办报刊等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国外时事、新闻，并发表时评，鼓吹中国进行变革，这些活动对改变世人的观念，唤起国人对封建束缚的反抗、对民主生活的渴望、对形成有利变革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如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写道：“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桎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国“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亦莫共和若”。⁴在官方机构对西方政事缺乏兴趣的情况下，来华基督教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介绍是当时中国人了解这方面情况的重要来源，时人称当时的中国已“非复前日蒙昧之象”，“诸国政令条教、盛衰大势，小有举动，早发夕知”。⁵

传教士对于中国时政的批评，无疑就像一面镜子，使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从中窥见了自身的丑陋，具有警醒奋起的效用。主要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人价值观念的转变，迫使长期生活在封闭天国的国人去承认另一种文化的存在，世界开始进入中国，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基督教会领风气之先，拓宽了国人们的眼界，

¹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见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页

² 《福州宣设报馆说》，1896年4月28日、5月1日《福报》。

³ 《The Chinese Recorder》January 1912 P24

⁴ 《民报》：1905年 第一期

⁵ 邵作舟：《邵氏危言》，卷下“译书”页四下，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在破坏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同时，又传播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近代意识的产生和价值观念的转换起了某种除旧布新的作用；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人民之革命”，号召“黄帝子孙皆华盛顿”¹，革命的意识在士人中广泛流传。

基督教会的西学传播活动，往往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会属于特定的团体，来自特定的国家，而且大多数教会人士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传教事业在名义上是为了上帝的王国，他们有时也会说爱自己的国家但也爱中国，但在实际上却始终自觉不自觉地服务于自己的国家。所以到二十世纪中国人不再容忍他们所传播的西学笼罩一层“圣光”时；当中国人在他们所传播的西学影响下（在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之前，教会所传播的西学，几乎是内地大多数人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走上反对君主专制、反抗西方基督教国家侵略的道路时，恐怕是基督教会所始料未及的。

基督教会的活动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么他对辛亥革命是否也有影响呢？笔者认为它对中国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引进，都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和高涨起了铺垫作用。而它来华的最直接成果——中国基督教徒更是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下面将要论述的问题。

二、参与革命的基督教徒

基督教是组织上联系很紧密的宗教，教徒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在全国反对外来侵略的大潮中，教徒往往被国人视为“异己”力量，受到打击，这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中国基督教徒在反对外来侵略的问题上，总是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中国人所反对的外来侵略者，恰恰就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传人。但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会感受到民族危机的压力，基督教徒当然也不例外，在早期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基督教徒可以说是革命的骨干力量，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一问题。

¹ 《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一）总体概况

第一个特点，我发现早期参与革命的基督教徒多集中于广东、香港两地，这一现象是与基督教早期的在华传播活动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在1842年前，清政府为了防范外人，只允许外人在广州一地做短暂居留和贸易，所以使得作为外人的传教士，可以在那里半秘密、半公开的活动；1842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也有传教士迁入，所以这两座城市是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方，虽然他们早期的活动并没有使他们的传教事业有太大的进展，但是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活动，在客观上却使这些地方的人们有机会了解西方的知识，使封建思想对人们头脑的桎梏开始松动。这两个地方由于受来华基督教活动的影响较早，通过中西对比，他们希望中国走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道路。近代中国最早受基督教活动影响而兴起的反抗活动就是在这附近开始的，洪秀全把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加以揉合，创立了他心目中的天国——“太平天国”；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督教徒——洪仁玕，也是受早期基督教活动的影响，他曾受雇于伦敦布道会达四年（1855—1858）之久，通过在香港和上海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和交往，使他有幸阅读了大量的教会书籍、期刊，并目睹了英国人在香港的种种经营，耳濡目染之中，使他对“西艺”、“西政”的知识有了了解，尤其是在传教士创办的各类报纸中，对世界地理、各国历史、经济贸易、时事新闻等的报道，更有助于他的理解。在他日后所制定的《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提及的与外人交往中，有二十一位为传教士，而美国传教士对他所写的《资政新篇》表示“并不令我失望”¹；另一位教徒——何启提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公平”²，可以想象这种言论在当时是多么的振聋发聩。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两个地方的民众较之其它地方的民众更具有反抗意识，家乡在广东的孙中山就是以“洪秀全第二”自居，期望能完成洪秀全未竟的事业。

另一个特点就是参与革命的基督教徒多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晚清时来华的部分传教士，将他们母国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寓于中国之上，鼓吹并支持中国变革。他们的思想，通过个别接触及教会学校的讲授，传递给了中国信徒。教会学校多

¹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6—167页

²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35页

成为革命思想酝酿及宣传的发源地。在西方教育制度中，若干民主原则的因素赋予了学生有某种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在外患频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学生的民族情绪和感情，就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默祈皇天多眷顾，令我华国速改弦”¹，反映了教会学校的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变革中国现状的思想。在二十世纪，教会学校是首先提倡剪辫易服的地方，新思潮在那里广泛传播；一些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建团结社，互相砥砺，激发壮志豪情。因此，基督徒及教会学校的学生的思想常较一般人前卫，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是很自然的事。中国的信徒及传道人通过接受西学教育，迳自产生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兴趣及认识，因而萌生革命思潮，亦在所多有。

（二）爱国教徒投身革命运动的原因分析

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反清密谋的有 15 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从兴中会成立到 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兴中会会员有五百人之多，在有姓名可查的 290 人中，有宗教身份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无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天主教，在禁止教徒参与爱国运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基督新教在 1907 年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上对此曾专门做了一项决议：“我们传教士要经常告诫中国教徒做忠心的国民，要尊敬他们国家的统治者，要爱他们的国家，要按期纳税。我们一概地阻止他们与政治的和秘密的团体所有的一切联系。”²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基督教徒投身于爱国革命运动呢？笔者认为他们是基于民族主义。那么什么是民族主义呢？大体说来，它是一种民族的自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集体意识。它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本民族内部彼此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由共同的历史回忆、共同的现实利益和共同的未来命运构成的，从而形成一种特殊关系和凝聚力量；二是个人对本民族的义务感，这种义务感是基于认识到如果整个民族遭受压迫和奴役而没有前途，个人以至子孙后代也将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从而产生应该把整个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¹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版，第 254 页

²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9 页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教徒投身革命的原因分析有如下的观点：“中国教徒大多受到清政府和教会的双重压迫，从而起来反抗，并投身到革命中去。追随帝国主义的教徒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农民是由于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险恶用心认识不清，为了逃避清吏的欺压和本乡地主的剥削而入教，认为入了教就能得到保护。谁知逃出虎穴，又进入狼窝。”并且引用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的一段话对这一提法加以证明：“传教士的田地是利用教徒充当佃农耕种的，强迫他们将收成的四五成，最高达八成交纳给教会，进行残酷的剥削。传教士还要佃农贡献鸡、鸭、鱼、肉、蛋、酒和核桃、贻礼费等。此外，还令教徒从事建造教堂、修筑圩寨、拉柴赶车、种菜挑粪、喂养牲口等无偿劳动。利用青壮佃户充当教堂的武装打手。如不履行以上义务，传教士就用罚款、罚送匾、罚酒、刑责或收回土地、开除教籍等惩办佃农。”¹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就引起了一部分具有爱国心的教徒既愤恨清政府，又痛恨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领导者如能采取团结他们的政策，就有可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队伍中。”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赞同，通过观察我在附录1中所列的《部分参与革命的教徒的个人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参与其中的教徒都不是“为了逃避清吏的欺压和本乡地主的剥削而入教”，即他们入教都不是因为生活所迫，也更不是愚昧的“吃教”者，也就是说他们决不都是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过中、高等教育或者是对基督教有着虔诚信仰的真正的基督教徒，所以他们不可能是因为“逃出虎穴，又进入狼窝”而投身革命，而且真正具有上述遭遇的基督教徒几乎都没有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来；另一个研究结论：“革命党人认为加入洋教有利于进行革命活动。传教活动得到清政府的保护，爱国教徒可以借传教的机会向人们宣传革命。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权利，而外国传教士和教会在中国却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建造的教堂俨如‘国中之国’清朝官吏不敢侵犯。”对此笔者以为，首先，这些参与革命的基督教徒大多数都是在参与革命前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决不是为了便利革命才加入基督教的；其次，作为基督教徒确实比普通民众享有更多的便利参与革命的特权，但这些人并不是因为拥有这些特权才参与革命的。²在此笔者不甚冒昧提出自己的观点，请专家指正。我认为近代基督教徒之所以投身革命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信仰与救国：“进步的政治运动发动，人们之所以积极参加这种运动，并不一定是因为群众首先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而总是直接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处境以

¹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² 以上研究成果均见韦国友：《教徒与辛亥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七期

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要求。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¹

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无数教徒追随孙中山,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如杨襄甫、左斗山、毛文明,等等,就是这类爱国教徒。教会学校中有不少学生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自己的祖国遭受侵略者的欺凌,也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绪:“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²“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洲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溺也”,革命就是要解决这种不满的现状,他们相信,基督教不但和他们的个体生命有关,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命。这些基督徒个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当他们掌握和观察这种基督教理想的优越性时,比较一下自己国家令人堪叹的状况,就产生一种抱负,要将这种理想实现于民族生命的复兴中。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县,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缩影,在檀香山、香港等地,他汲取到了西方文明的养分,形成了另一种理想抉择,他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识的)作为一种传输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³康德黎在给孙中山的挽词中有这么一句话:“孙中山革命的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苦心苦行、百折不挠,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⁴史坚如于1899年受感成为基督徒,他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他在1899年在香港与宫崎寅藏谈及他革命思想的来源时说:“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原则而工作”⁵。刘静庵(字,敬安)是日知会首领,在日知会机关遭到清政府破坏后,被捕入狱,他在监狱时信奉耶稣救世真理,久而弥笃,狱吏及同狱者多被他感化,“同狱之殷子衡叩敬安曰,连夜闻君祈祷之声何为。敬安曰,维摩诘病在斗室,佛法及于三千大千世界,耶稣降生马槽,福音遍传于南北两极;予持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绁,心在天堂,汝未观新旧二约乎?三界唯心,有所归依,

¹ 《马克思选集》

² 黄乃裳:《绂承七十自叙》,转引自詹冠群:《论黄乃裳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兼谈新发现的史料》,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九期

³ 陆丹林:《革命史谭》,转引自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一辑,第56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⁴ 《社会学与台港社会研究》1986年第十期,第142页

⁵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52页

即不乱也。自度度人，汝其急信道以求解脱患难中之孽障乎”¹，他求耶稣来救助中国的苦难，认为基督教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他人、救国家、救世界。“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后来孙中山也曾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²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革命理论都是从宗教书里找出来的，只是说爱国教徒在寻找救国真理时，确实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得到了某些启迪。一位爱国教徒说：“在满洲人的统治下，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于是上帝将革命的信息传递给我们。”³

作为一个中国人，基督徒革命者的爱国意识，并没有因为信仰基督教而淡泊，反而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理想，进而促使他们对国家更积极的关注。晚清基督徒革命者在爱国一事上不是文化主义，也不是纯粹要实现基督教的理想，更不是以打倒传统为职业，他们所关注的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落后，导致民不聊生，外患频仍。他们关注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基督教理想只是作为改良祸国殃民的现存政府的一个药方而已。孙中山曾说：“为吾人之宗旨，无非欲得一良好政府而已”、“革命之宗旨不在‘反满’，其最终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国”。

基督徒在革命早期虽然组织并参与了革命，但并不是教会内部有组织的行动，而是基督徒个人自觉性的抉择。同时在革命思想形成以及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基督徒并没有隔绝非基督徒，二者合作无间。因为革命的基督徒的大前提不是要实现教会的使命，而是要实现民族的使命。他们从宗教的某些教义中得到启发，从而萌发了反清的革命理想。宗教中的某些教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近代传入中国的新教，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五湖四海皆兄弟姐妹”的思想。傅兰雅在《佐治刍言》一书中介绍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消除这世界上的不公正，废除旧世界，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愿”⁴。爱国教徒入教后，在进步教义的启迪下，目睹处在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自然就产生了革命的念头。

¹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二集，第57—59页

²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6—447页

³ 《The Chinese Recorder》January 1912 P33

⁴ 王以培：《基督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基督徒走上反清的道路，不是基于无法循正途跻身社会上流，而是基于基督教所赋予的一种理想、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他们在革命过程中不惜舍弃个人利益，即使牺牲生命和所有财产也在所不惜的根源。

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基督教的理想是拯救祖国的良药，同时也抱着将基督教理想在中国实现的愿望，使中国人民能脱离黑暗和愚昧，希望中国从此能走上富强的道路。

同时基督教福音拯救的观念，也强化了基督徒革命者面对祖国危机时所爆发的救国冲动，福音拯救观念把他们推向实践，因为福音的拯救不只是一个观念，亦兼具有催促观念持有者去行动的动力。对他们而言，这种行动一如耶稣救人，是本于无私博爱和牺牲精神的，这种精神成为他们革命道德和勇气的支柱。且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在革命中暴力是实现无私的爱拯救的必要手段，爱和暴力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徒看来并不冲突。孙中山说：“我们最大的希望就在于用圣经和教育作为教导苦难同胞的办法，使他们了解上帝的祝福存在于公正的法律之中，苦难的解脱发见于文明进化之途。我们千方百计地努力以不留血的手段来夺取国家，建立政府。我认为，我们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样做注定要失败，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武力。我们四万万同胞必须要，也一定会从残暴野蛮的酷政中解放出来。”¹在这里，孙中山避开了基督教和革命的冲突，认为基督教是可以为革命服务的。

信仰与文明：在近代中国，绝大部分早期的基督教徒文化程度都很低，甚至是文盲，家境也大多很贫穷，一般人也多不愿意送子女进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外国差会大量注入资源，天津、北京条约又允许传教士在内地传教，致使教会学校培育了不少受西学熏陶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商人，其中有些人皈依基督；十九世纪因移民、工作或留学到外国的华人中，也有一些人成为基督教徒。中国基督徒中就此出现一批具有新式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是有密切关联的。“其教广行西洋，无国不遍”。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入的探讨了新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他说：“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

¹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47 页

训的管理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那么为什么新教伦理能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动力呢？在他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禁欲、进取与信仰上帝的奇妙结合所造就的新教伦理，不仅使人们从中世纪黑暗的专制统治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而且成为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与动力。¹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和近代民主制度相暗合的思想，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冲突，恰恰在于破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以宗法和封建两大制度为护符的特权阶级，与主张君主独裁的政体背道而驰，逆光折射下的平等，成为人们近代伦理观念转变的依据，在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绝境的19世纪，新教的这种不自觉的启蒙作用，把人们从传统思想和保守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启迪人们去寻找新的寄托。

基督教宣称无论什么人，只要信奉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便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信仰使得人人平等。这种神学灵光掩盖下的平等，共有二层意思：一是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唯有创造了人，而没有创造君主和教皇，所以人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职务的不同，人生来都有罪，即原罪，君主和教皇都不例外，在原罪面前人人平等，其寓意是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二是基督教宣扬同胞之爱，只要是基督教徒，全以兄弟姐妹相称，应放弃相互之间的隔阂。这样，赤裸裸的等级制度与神学灵光下的“人人平等”必然发生冲突，平等观念严重地冲击着君权。中国官绅士民痛心疾首地说：基督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君臣互称兄弟，“不服官管，是无君也”，“至今西洋诸国教主之权重于国主，政令大者悉由教主，稍有违忤，废立由之；赋税所入，大半归诸教主，供其资用。”“自弛禁以来，所见奉教之人无不指斥乘舆”。上述言论，比比皆是，它反应了基督教对中国君主权威的冲击。

在基督教最早期，即使徒时代，就有上帝比世俗权柄更超越的观念，从此以后，早期教父在政教问题上也认为地上政权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要顺从上帝。这样一来，就把中国传统神圣的帝王观念消解了，既然效忠的对象有了比君主更超越的上帝，那么对君主的忠贞就不是绝对的了，推翻它也不会构成道德沦丧，笔者以为这就是当时基督徒革命者典型的君主观念。他们同时认为世界是由上帝

¹ 王以培：《基督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页

所创造并交给君主管理的，君王要对上帝负责。早期的革命者中士大夫很少，只有基督徒和受过西式教育的人以及会党，才肯从事被当世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反清运动，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中国人信教后，基督教的内容，就自然成为他们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一个参考架构，这个架构一旦形成，就对现实起了一种批判作用。批判思维的发生，是因为基督徒接受了中国传统以外，并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一套信仰，而这种信仰要求皈依者将之视为一种委身性的信仰去接受；换句话说，这信仰是一种个人的“终极的关怀”。中国的基督徒不一定反传统，但往往视新接受的基督教价值比本国固有的传统价值更高，“无论曾受文化与未受文化各种族，一经改正教传至其地，罔弗靡然从风，以增高其人民之品格程度，令其发生种种之新理想，而各欲作昂头天外之观”¹。

基督教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成为其中一些基督徒参与革命的动力。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对生命的尊重引发出西方人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主动进取的精神，中国基督徒投身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这种对生命尊重的观念所触发。这些基督徒抱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见到祖国非人性、伤害人的政治，就产生不满，同时也引起一种“拯救”的意念；同时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使信徒们相信，每个人除了自己的生身父母之外，还有一个人人与共的天父，在上帝天父面前，人人都享有同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种主张个人直接与上帝相联系，并把追求个人幸福作为生活目标和人生哲学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统治。

简而言之，基督教的伦理一度给信奉它的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文明，那么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往昔的中华民族，在重重枷锁的桎梏下，需要怎样的抗争才能获得新生呢？这正是近代基督徒在新教伦理的熏陶下一直在苦苦思索并努力实践的探索。

信教与革命：基督徒为何投身革命事业呢？据史扶邻的解释是，由于他们原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高，只有通过革命、推翻现存的既得利益阶层，才能获得

¹ 黄乃裳：《绂承七十自叙》，转引自詹冠群：《论黄乃裳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兼谈新发现的史料》，人大复印资料 2000 年，第九期

晋升。这个说法笔者不赞同，通过前面的分析，这一点也并不难看出。基督徒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教徒这一身份，因为教徒这个身份是受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保护的，倘若他们受到中国官吏任何不公平的待遇，都会引来外国领事的干预，进而演变为中外冲突，这是地方官员所惧怕的。例如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尚未爆发前，两广总督谭锺麟已得到有关孙中山行动的密告，但由于孙中山是基督徒，故在未有确实证据前，清政府还是不敢妄行将孙中山拘捕。而且一旦革命事败后，基督徒的身份又常使参与者得以逃脱官府的缉捕，尤其是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介入下，那些从犯多数得以免罪。因此，一些非基督徒的革命党人，甚至冒充基督徒以求取得同样的特权，黄兴便是其中一例。¹在这种特权的保护下，他们可以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放心的去从事革命事业。

基于同样的理由，教堂也在条约保护之内，中国官吏不敢随便进入教堂搜查，因此教堂常被革命党人用来做为贮存弹药危险品的地方。

这里并不是说凡是基督徒都可以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但是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往往给予执法者在法律条文以外更大的权力和空间，基督徒的“特权”正是获得了此等法外的权力。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监督下，中国官吏被迫只能按着明文法、甚至采纳西方对刑法的观念(搜集了足够证据后才能控告涉嫌犯)来办理，这样便受到很大的掣肘，也为基督徒革命者提供了很大的安全和方便。

三、教徒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

(一) 领导作用

说到基督教徒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必须提到的就是辛亥革命的灵魂人物，著名的基督教徒——孙中山，他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起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陈述。但是因为孙中山是一位知名的基督教徒，所以我想简单论述，孙中山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与他作为革命领导者之间的关系。

孙中山与基督教有着不解之缘，他从1883年加入基督教到1925年在北平病

¹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47—248页

逝，在作为基督教徒的这四十多年里，基督教徒称赞他是“学问渊博，身怀悲悯，……于基督教有深造之功，有坚卓之信”¹；在病逝前他还叮嘱亲友：“我本基督徒”，²那么作为革命灵魂人物的孙中山为什么矢志不渝的坚持自己的基督教徒身分呢？笔者以为这是源于孙中山信仰基督教与他投身革命之间有着一种“情结”。

孙中山所信仰的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新教，这一教派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体内必然注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这种近代精神都在其教义中得到了派生性的体现。马克斯·韦伯说：“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所以在西方产生并获得成功，与新教伦理精神的深入人心，有着直接的关联。受到这种精神浸润的新教徒内心深处往往只与‘上帝’发生感通，由此促进了个人尊严的意识，并导致了一种与理性的劳动组织相一致的个人主义，激发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勇于进取、竞争和创造的动力，资本的积累和无止境扩张便是在这种精神的观照下出现的。”³殖民主义者固然可以把“传教”作为其一种侵略手段，而孙中山却从该教教义中获取了可资利用改造，可作为革命思想武器的素材。他多次指出自己是将耶稣作为救世的革命者，而不是将其作为神化的人来崇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信基督为革命家，及为划除一切不平等者”⁴；他曾说：“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⁵；“耶稣降世拯救穷苦的人，命运乖蹇的人和那些处于奴隶境况的人，……正是因为这种类似的镣铐桎梏束缚着中国，所以我从事自己的改革运动”⁶；在他看来，“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谋求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⁷而且他不把《圣经》等教义奉为恪守的经典，只是将其作为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他将教义中的“博爱”思想解释为救世救国之“仁”的自我牺牲精神，指出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耶稣教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这和革

¹ 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转引自《文史哲》，1995年第六期，第75页

² 《申报》：1925年3月23日，《孙中山殡仪记详》

³ 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287页

⁴ 《孙中山耶稣观追记》：《申报》1925年3月28日

⁵ 转引自陈建波：《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五辑

⁶ 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96页，转引自《文史哲》1995年第六期，第77页

⁷ 转引自陈建波：《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五辑

命家的“救国之仁”是同一心志的，¹他认为，为社会、国家谋幸福，须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并认为可以马丁路德及华盛顿等人作为榜样。²

基督的舍己为人、百折不挠的精神，被投身革命的基督教徒定格成革命的动力并经常以此来互相勉励。孙中山还常以教徒的身份鼓励参与革命的教徒，他曾对教徒黄大汉说：“我地系教会中人，做事要有毅力，不可灰心”³。孙中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与耶稣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是不无关系的。

孙中山曾多次指出自己的革命思想得诸教会和传教士，1912年9月他出席教会的欢迎会时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⁴1922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强调：“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⁵。孙中山的这些话虽不免有溢美教会与传教士的成分，但他的感受与体会是真实的——基督教所宣传的救世思想，的确是促使孙中山立志反清救国和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的思想动因之一。他青年时读《旧约》，读到摩西导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时，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⁶

孙中山认为教会的活动开启了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民智，输入了欧洲文明。他们在以新思想和科技知识开创中国社会新风和启迪民智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从而有利于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他在1912年的两次演说中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之异族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而来。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实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所当感谢者也”，并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⁷。1924年他在演讲时再次强调：“夫教会之传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于埃及者然”⁸。孙中山在此将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及民国的创建与基

¹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23页

² 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8页

³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70页

⁴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6—447页

⁵ 陈旭麓：《孙中山集外集》，第266页

⁶ 崔沧海：《史烈士与基督信徒合作革命之信史》，转引自，《文史哲》1995年第六期，第77页

⁷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68、447页

⁸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37页

督教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实则从一个侧面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孙中山品格沉静博大,待人诚恳和善,关心下层人民生活,注意民生问题,这都与其青年时代受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的影响有关。

正是由于他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转变成了要在中国实行“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信仰,才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把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奋斗。

(二) 以各种形式支持革命运动

爱国教徒由宗教信仰上的契合进而为政治上的结合,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参加了辛亥革命,有的以传教为掩护,鼓吹革命;有的把教堂、教会学校、教会书楼等提供给革命机关从事革命活动;有的则从财力上对革命活动给予支持,或是支持革命报刊的发行等,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

以传教为掩护,鼓吹革命:广州著名的女医生张竹君是一个信仰耶稣的基督教徒,她肄业于美国长老会的医学堂,她在开设的医室之外附设福音堂一所,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广召亲友多人,在内宣扬基督教福音,间或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于是城中教育界及报界中人大为倾倒。后来由于她和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深受他们的影响,极力赞成颠覆清政府。她巧妙地把反清思想与《圣经》里的某些教义糅合在一起,向人们宣讲,使不少听众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感染,激发了爱国热情,走上了反清救国的道路。¹

在武汉地区,爱国教徒也采取了类似方式宣传革命。武昌高家巷圣公会是由美国人创办的教堂,由胡兰亭主持教务,胡兰亭是一位具有革命思想的传教人员,他联合文华书院中学部教师余日章(见附录1),组织了“救世军”,成员都是学生。每逢星期日下午,他们带领学生,扛着红底黑字的“救世军”旗帜,由乐队领先,走上大街,“以宣传教义救世为名,趁机宣传革命道理,抨击清廷的腐败黑暗”²,史书记载:“武昌基督教圣公会牧师胡兰亭、黄吉亭等,均有心革命,常于说教讲

¹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9-40页

² 《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第143页

道时，假基督舍身救世等为宣传革命资料。”¹

黄旭升利用任职播道的机会，“每在教堂宣道时鼓吹革命，收效甚广”²

总之，这些爱国教徒利用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保护传教人员的条件，向广大群众灌输反清的革命思想，使部分基督教徒和群众对革命活动给予支持或理解。

掩护革命者脱离危险：1895年，广州起义前，两广总督谭钟麟对镇压起义犹豫不决，原因之一就是孙中山是个基督教徒，而基督教徒是有一定的豁免权的；杨襄甫牧师设在沙基的西药房和佛山镇的走马路福音堂，曾两次掩护孙中山逃离清兵的追捕；杨牧师还通过与潇雨滋牧师的关系，将中国基督教播道会的“福音船”，利用为革命党人在广州珠江两岸活动的“交通船”³；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中，更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来感动英仆柯尔，他说明自己作为基督徒受清廷迫害，就如同惨遭土耳其苏丹杀戮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一样；1904年孙中山因受保皇党徒和清朝驻旧金山领事指控，被拘役到移民候审所，也是因为教徒伍盘照、司徒南达等人的鼎力协助，才得脱险；在长沙也有同样的情形，“甲辰九月，黄軫（黄兴）、刘揆一、马富益等谋在湖南举事，不幸期前事泻，黄軫潜避于长沙吉祥巷圣公会，赖黄吉亭、曹亚伯之助，间关出险”⁴；“辛亥年8月武昌革命军起，革命党领袖黄克强在香港闻讯，谋设法入鄂，竹君组织红十字救伤队，使黄克强乔装队员，因得避免各关津骚扰。”⁵

将教会等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机关：在长沙、武昌的圣公会，武昌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彼得堂，广州的双门底的长老会福音堂，四牌楼的长老会礼拜堂，下芳村的巴陵会福音堂，双门底的圣教书楼，花地的培英书院，芳村的格致书院，仁济大街的博济书院，顺德县城的长老会礼拜堂，广州油栏门的鸿兴客栈等均是彰明较著的革命党人活动处所。如，双门底圣教书楼是教徒左斗山开设的新学书店，书楼后设有礼拜堂，是收藏革命文件、党人名册、武器弹药的秘密场所；志道书楼则是爱国教徒宋居仁设立的兴中会据点，苏焯南、黄大汉等革命同志，常来此聚会，共商大计；巴陵会的神学学校是爱国教徒李植生的任职单位，李植生除了为革命党人研制炸药外，还负责把从香港接运来的军械、炸药秘密储藏在学校

1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52—53页

2 《革命逸史》，第三集，第92页

3 梁图光：《有关孙中山革命与基督教关系的资料》，转引自《天风》，1986年第十期，第13页

4 《革命逸史》，初集，第247—248页

5 《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9—40页

里，因此美国学者史扶邻说：“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活动中，他的基督教朋友为他提供了贮藏军火和密谋策划的庇护所。”¹

爱国教徒在革命思想宣传上的支持：教徒崔通约和邓干隆于1903—1904年分别在香港的《世界公益报》和旧金山的《大同日报》中担负重要工作，他们抨击时政，宣传革命；此间，教徒党人毛文明等也在檀香山希炉埠组织演说会，是最早请孙中山赴埠演说革命真理、批判保皇邪说的；教徒黄旭升请孙先生在檀香山正埠西人和华人戏院连日演说革命真理，批判保皇谬论²；旅美华侨、《中西日报》社长教徒伍盘照当时曾为孙中山慷慨捐印邹容的《革命军》11000多册，分赠全美华侨，以广宣传；教徒党人宋耀如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圣经》印刷厂，也为孙中山免费印刷过革命宣传品；具有“风流才子”之称的爱国教徒陈少白是孙中山早年的战友，兴中会初期拟订的各种文告，多出于他的手笔，他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积极鼓吹革命，并与保皇会的《商报》展开论战。《中国日报》（1899—1913）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被称为“中国革命党组织言论机关之元祖”³；区凤墀是广州有名的传教人员，语言文字功夫颇深，是孙中山的业师，广州的农学会宣言就是他执笔的，同时，他还是陈少白办好《中国日报》的有力支持者；1903年基督教徒郑贯公与香港圣士提反堂的爱国信徒林护、谭民三等人创办《世界公益报》，宣传革命，此报刊世称“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⁴（后来他又创办《广东日报》，世称“香港革命报纸之第三种”），第一家则是陈少白主持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伍于衍是三蕃市的长老教会信徒，与教徒伍盘照，都是兴中会会员，他们创办福音性报刊《中西日报》，在三蕃市华侨中鼓吹革命，并承印邹容的《革命军》，分送华侨，激发华侨的反清意识，《中西日报》成为当地重要的革命报纸；等等，这些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并为中国同盟会的建立作了精神上的准备。

爱国教徒在财力上的支持：不论是创办革命刊物，还是发动武装起义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教徒党人对此给予了慷慨的资助。1900年初，在香港出版的《中

¹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² 《革命逸史》，第三集，第92页

³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⁴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国日报》，受保皇党人破坏和控告，有停刊危险，香港循道会教徒李煜堂拨款承购该报，并支持该报经费多年，直至辛亥革命胜利¹；1903年，教徒梁慕光曾出资从香港购买一批军械，秘密运回广州，藏在神学院内；1904年，孙中山到旧金山改组致公堂后，要赴全美开展总注册工作，初期的4000多美元旅费，是由教徒伍盘照、伍于衍、邝华汰等人募集捐赠的；为革命筹款，不少人虽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香港富商李升的儿子李纪堂，就是这样的教徒，他于1900年加入兴中会，那时正值孙中山筹划惠州起义，孙中山委任他担任财务主任，不幸起义失败，善后用款十七、八万元都由他支付，后来洪全福起义所需巨额经费也是他拿资助的，据说李纪堂在这次起事中捐献了50万元，从此以后他的百万家产就不剩多少了，冯自由说：“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²此外，《中国日报》由于销路不畅，经费拮据，他又慨然相助，使这份报纸得以长期维持。由于他襄助革命，家财散尽，到晚年“几于身无立锥，求一饭而不可得”。但他安之若素，从无怨言，人们在他死后赋诗称颂道：“纾难倾家第一人，共和缔造几元勋。釜鸣钟弃寻常事，且作微员救赤贫”。³这首挽诗道出了他无私援助革命的光辉一生。

爱国教徒直接投身革命：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基督徒党人是这两次起义的核心力量和重要骨干。蓝天白日旗的设计者陆皓东，是位爱国教徒，陆皓东是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的，他在就义前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⁴孙中山称颂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在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基督教徒占参加起义人数的30%⁵，而且这次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皆为教徒党人，助饷最得力的邓荫南、李纪堂也是基督教徒，起义皆得教徒左斗山、王质甫等人提供圣教书楼和礼拜堂及福音堂等作为秘密机关。在惠州起义的同时，广州革命者也策划了一场谋炸广东巡抚、署理总督德寿的活动，这次活动从部署到实施，几乎都是由爱国教徒负责的，先是由邓荫南、史坚如、练达成等人共同商定，由练达成找到旗人爱国教徒宋少东，让他出面在巡抚衙门

¹ 转引自梁图光：《有关孙中山革命与基督教关系的资料》，《天风》，1986年第十期

²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92页

³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16页

⁴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第659页

⁵ 《革命人物志》，第十集，第416页

后花园附近租赁一间房屋作为爆炸地点,然后由苏焯南把从香港运来的炸药送到教徒黄守南管理的城南五仙门福音堂储藏,其它危险物品存放在城西宝华大街长老会牧师毛文明处,负责爆炸的是史坚如,可惜由于火力不猛,未将德寿炸死,而史坚如却被清兵逮捕,后惨遭杀害¹,孙中山称他是与陆皓东齐名的“革命健将”。事隔十年,1911年又爆发了震动中外的黄花岗起义,在这次起义死难烈士中,有名可查者数十人,其中有爱国教徒6人,他们是劳培、李炳辉、韦统淮、韦树模、韦统铃、韦荣初等,劳培是广东东平长沙塘乡人,18岁时父母想给他娶妻,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为革命决心不娶,牺牲时年仅26岁;李炳辉是广东肇庆人,侨居南洋,自幼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被分配到新加坡英国长老会教堂传教,同盟会员罗仲霍去南洋宣传革命时,他毅然加入同盟会,黄花岗起义时,他决心回国参加战斗,不幸在进攻督署的激战中英勇牺牲,当他回国途经香港时,他的母亲来信催他回家,他复信说不能回家,并附诗一首表达心意,诗曰:“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堕地时,惭愧劬(qū,二声,劳苦、勤劳)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²。赤胆忠心跃然纸上。在辛亥革命运动高涨后,尽管南洋地区的教会“疑神疑鬼”“态度渐渐变了”,拒绝接近革命党人,但各地仍有不少教徒支持和参与革命斗争,在此不一一列举。革命失败后,部分基督徒党人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讨袁护法,为捍卫民主共和制而斗争,教徒沈缙云在“宋案”后大力支持孙先生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他在遭到毒害时说“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³;教徒徐谦从1917年起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他是先生晚年时期的重要助手之一。

历史证明,成为基督徒并不会失去中国人身分的意识和对祖国的责任感,通过对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了解,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民族的责任感。基督徒信教后不但仍然保持爱国的民族主义,又因信仰基督的缘故,在思想上又具有了新的价值观和理想,使得他们在面对中国现实处境时,形成了批判思维,特别是信仰中的“上帝超越一切”的观念,使他们比一般的国人更清晰的发现君主的平凡性和非绝对性。

尽管官府和士人视教徒为“非我族类”的异己力量,但是事实表明,无论是

¹ 《革命逸史》

² 邹鲁:《广州三月廿九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9版,第154页

³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141页

否受到国人的疏离或排拒，这群基督徒永不放弃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责任。中国信徒身上的爱国心并没有因为信仰洋教而泯灭，梁发这位一再被官府缉拿的“逃犯”，在鸦片战争前夕说“如果英国政府派遣兵队来到中国杀害中国人，那么中国此后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听英国传教士讲道了”。到1904年，基督新教徒的人数已从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13万人，到1914年发展到25万人。但是参与到晚清革命中的教徒只是凤毛麟角，这说明，在晚清政府和传教士的压迫下，教徒的民族和民主意识还没有全体、自觉地觉醒，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与到了晚清革命中去，这就表明教徒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信仰来自于外国而有所改变。在近代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教徒的爱国意识在蠢蠢欲动，经过不到三十年的沉淀，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徒更大规模的参与到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去，他们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¹这表明在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中，基督徒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在国难逼来、外患频仍之际，他们以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们不是只将目光投向超世，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群，尽管他们拥有西方的教育和信仰的背景，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积淀的是一种历史和文化哺育出来的深沉的民族心理。

结 语

通过对基督教徒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来华基督教会，以基督教和西学为武器，从企图“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发展到企图改造中国。

他们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给予批判，并将西方的政治理论引入中国；他们还通过开办学校、翻译西学、创办报刊等活动，给闭目塞听的近代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知识，诱发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摆脱愚昧、落后状况的愿望；在最先有基督教活动的广东和香港两地，部分中国基督教徒基于救亡和建立文明国家的信念，投身到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中，成为辛亥革命中的特殊群体，在革命中起了领导和骨干的作用；他们以各种形式投入到革命中，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做出了贡献。

虽然近代来华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在思想文化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¹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月版，第138、360、516—530页

但是从总体上讲，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而是为了基督教会的利益，为了其派出国的利益，因此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就连与基督教会联系最紧密的中国基督教徒也走上了基督教会最不希望看到的道路。

在近代中国，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作为外来社会力量的基督教会，它们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歧异与趋同、冲突与调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与互相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渐趋深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居住在我国广大国土的数百万天主教、基督教教徒,应继承辛亥革命时期爱国教徒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附录： 部分参与革命的教徒的个人资料¹

张竹君：隶属于长老会。广州著名的女医生，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肄业于美国长老会的夏葛女医学堂，毕业后悬壶济世。她在医室的外面附设了一所福音堂，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广召亲友多人，在内宣扬基督教福音，间或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于是城中教育界及报界中人大为倾倒。每周宣讲圣经时，座中知识阶级及非基督教徒几乎过半数。后来由于她和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深受他们的影响，极力赞成颠覆清政府。她巧妙地把反清思想与《圣经》里的某些教义糅合在一起，向人们宣讲，使不少听众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感染，走上了反清救国的道路。后来她开设的育贤女学，成为广东女学的先声，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女学生。此外她还结交革命志士，曾组织救护队救助黄兴脱险。

胡兰亭 黄吉亭：隶属于圣公会。二人均在美国人创办的教堂——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主持教务。“胡黄均有心革命，常于说教讲道时，假基督舍身救世等宣传革命”，他们联合文华书院中学部教师余日章，共同组织了“救世军”，成员都是学生。每逢星期日下午，他们带领学生，扛着红底黑字的“救世军”旗帜，由乐队领先，走上大街，“以宣传教义救世为名，趁机宣传革命道理，抨击清廷的腐败黑暗”。并且在1904年9月，曾帮助黄兴逃难。

黄旭升：广东连县人，号扶桑，檀香山基督教宣讲师，借传道鼓吹革命，“每在教堂宣教时鼓吹革命，收效甚广”，民国后经营实业。

黄乃裳：隶属于美以美会。黄黻臣，字乃裳，别号慕华，福建闽清县人。波罗洲沙捞越华侨。1891年任新加坡《星报》总编辑，带领逾千具有美以美会背景的福州教徒创立新福州，甲午期间，他开始阅读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撰写的《大美联邦志略》，1895年又协助传教士蔚利高撰写《大美国史略》，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他感觉到美国由于实施“民主政治而得以富甲天下”，流露出“艳慕、效法之情”，反满以及在中国施行民主政治的思想由此产生，他回国时携带《图存篇》（《革命军》）五千卷，闽内人士多受其启发，人心大变。

¹ 以下资料参见《革命逸史》、《天风》、《武昌革命真史》、《辛亥革命与华侨》、《华侨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料选辑》、《辛亥首义回忆录》、《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

黄花岗起义失事时，死难的闽人有 20 余人，其中他的弟子占半数。参与 1907 年秋起义的策划。福建光复后任交通司长，民国 13 年寿终，享年 80 余岁。

曹亚伯：湖北武昌兴国州人，1903—1904 年结识武昌基督教圣公会牧师胡兰亭、黄吉亭等，二人有心革命，亚伯与之志同道合，遂皈依基督，并共同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会所设于圣公会教堂内。曾多次救助革命同志脱险，1906 年赴英国，向外人宣传中国革命，护法运动兴起时曾说“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民国 18 年出版《武昌革命真史》，受该书牵连，后专心学佛，民国 26 年圆寂。

殷子衡：亦作子恒，教号，勤道，湖北黄冈人，光绪丙子生人，办过学堂，在黄州与人创办鸿译书舍，专门印刷革命书籍。与刘贞一同狱时，受刘的教化皈依基督，刘贞一为他取名勤道，1912 年胡兰亭为他施洗，在刘贞一的影响下参与革命，1919 年受吏职，1920 年任武汉圣公会会长，解放后在湖北文史馆工作，1957 年逝世，著有《中华婚姻鉴》、《中国哲学摭言》、《比较宗教学》、《皈依基督自述》、《中国基督教两大伟人》等书。

徐宗汉：原名佩萱，广东香山人，因为与张竹君交好，在她的影响下受洗入教，支持张竹君投身革命、开办福利事业。1907 年加入同盟会，1908 年在广东设立守真读书店，作为革命机关，1911 年春广州大举，率亲属运输枪械并亲往分发，后嫁于黄兴。1928 年接办南京遗孤教养所，后兴办农场，1944 年病逝重庆，终年 58 岁。

崔通约：广东高明人，原名洞若，康有为弟子，后入基督教，与革命志士有往来，史坚如被捕后，曾奔走营救，1903 年与郑贯公创办革命报刊《世界公益报》，后在上海病逝。

刘敬安：原名贞一，字敬安，又号静庵，湖北安陆府潜江县人，生于 1875 年。皈依基督时道号保罗，以普渡众生为己任，1903—1904 年参与创设日知会。宣传革命思想，1906 年被捕受尽严刑，他在狱中每夕祈祷，狱吏及同狱者多受其感化。“同狱之殷子衡叩敬安曰，连夜闻君祈祷之声何为。敬安曰，维摩诘病在斗室，佛法及于三千大千世界，耶稣降生马槽，福音遍传于南北两极；予持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縲绁，心在天堂，汝未观新旧二约乎？三界唯心，有所皈依，即不乱也。自度度人，汝其急信道以求解脱患难中之孽障乎”。1911

年5月死于武昌模范监狱。

郑道：字贯一，广东香山县人，年少时有神童的美誉。1899年进入由梁启超主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自称是中国的摩西，并著有《摩西传》。脱离保皇派后，创设半月刊《开智录》，阐述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派人员，保皇派人员因之豁然觉悟者，不乏其人。1901年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1903年与基督教徒林护、谭民三，冯活泉、苏卓南、崔通约等创设《世界公益报》，该报资金全部出于基督教徒，后来因为资金不足，停刊。1905年又开办《有所谓报》以小品文字开导社会，1906年染恶疾数日后死去，年仅26岁。

郑士良：字弼臣，广东归善县淡水墟人。在广州油兰门由德国教会开设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毕业后入博济医院学习医学，与正在学校学习的孙中山志同道合，成为知己。1895年之役专任联络会党，并参与惠州起义等革命活动，1901年饮酒时中风而死（一说是清朝官吏买通他的友人郑梦唐在酒菜中下毒）。

秦力山：秦鼎彝，又名油，号俊杰，又号力山，别号遁公、巩黄，湖南长沙人。先后就读于湖南时务学堂、东京高等大同学校，逐渐醉心革命。运动义和团反清复汉不成后，加入自立军，1901年在东京发刊《国民报》。1902年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1903年组织“中华义学”教育华侨子女，1905年赴缅甸主持《仰光新报》，宣传革命，1905年染重病身亡。年仅29岁。

李纪堂：名柏，号纪堂，新会人，香港富商李升之子，1895年秋孙中山东渡日本，他久慕孙中山之名与之结识，后加入同盟会，多次资助革命党人，曾资助惠州起义、大明顺天国起义，前后助饷数十万元，后来家道中落，1904年资助革命报刊《中国日报》。辛亥后，任交通司长，数次任县长，民国26年，潦倒万分，民国28年任侨务委员会委员，民国32年在重庆病故。

李煜堂：名文奎，字煜堂，广东台山县人。结交革命志士，1906年资助革命报刊《中国日报》，从黄花岗起义至辛亥起义的汇款、弹药储存都经其手，辛亥革命后任财政司长，去职后致力于教育、交通、公益事业。一生中好进取，破除迷信、乐善好施、洁己奉公。民国25年1月1日逝世，享年86岁。

谢缙泰：字日昌，号康如，广东开平县人，出身洪门，1887年肄业于皇仁书院，庚寅年与杨衢云在香港设立辅仁文社，1895年参与创设香港兴中会。他

精通英文，在革命筹划中，专任联络西报记者，甚为得力。1895年起义失败后，曾任香港《南华西报》编辑，组织参与营救广州起义被捕人员，1902年参与大明顺天国起义的筹划，晚年锐意经营农矿事业，因资本短缺，无所进展。1939年病逝于香港，终年66岁。著有英文《中国革命秘史》。

陈白：字夔石，别号少白，新会人，孙中山雅丽氏医学院同学，“四大寇”之一，擅长文学，兴中会文告多出其手。曾出任海外团体中和堂顾问。1899年在香港创设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中国日报》，1905年任香港同盟会会长，辛亥后粤省光复，任外交司长，后从事商业活动，民国24年在北京逝世

杨襄甫：新会人，传教士，博济医院助教，博通中外史籍，尝数次向孙中山条陈治国法案，民国成立后任农林部参事。杨襄甫牧师设在沙基的西药房和佛山镇的走马路福音堂，曾两次掩护孙中山逃离清兵的追捕；杨牧师还通过与潇雨滋牧师的关系，将中国基督教播道会的“福音船”，利用为革命党人在广州珠江两岸活动的“交通船”

伍汉持：广东台山县人，肄业于佛山医学院，笃信基督教，1905年主持创设九龙光汉学堂，崇尚“武”精神。后进入法政学堂学习。1907年参与谋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民国二年春当选众议院议员，1913年被清捕于法租界，不久被杀。

伍盘照：广东新会人，宗教家。善长英文，1900年在旧金山创立《中西日报》，该报印《革命军》1万1千册，分送侨胞。1903年冬，孙中山前往檀香山时，被拘禁于木屋，伍盘照营救孙中山脱险，民国初年逝世。

余日章：湖北蒲圻人，光绪八年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日知会会员，刘敬安被捕后，他曾多方营救。武昌起义时联络中西人士组织红十字会救死扶伤，1913年任中国青年会讲演部主任干事，1919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36年在上海逝世。

温生财：字练生，广东梅县井塘乡人，年少家贫，因受基督教熏陶，深明大义。辗转各地，备尝辛苦，适逢革命党宣传革命加入同盟会，热心于暗杀运动，1911年杀清将领孚琦，被捕后言“恨无百金舟车费，否则入京师可以大得志”，“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陆皓东：广东香山人，原名中桂，与孙同创兴中会，建议共和国采用青天白

日旗，9月广州起义被逮捕，殉义，是为革命流血之第一人。

区凤犀：南海人，传教士，孙中山国学老师，“逸仙”是他为孙中山起的。1895年起义后在香港华民政务司公署任职，由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曾得到他的帮助。

邝华汰：广东人，1903年冬，孙中山在旧金山开筹饷会，在会上他第一个出钱资助革命，被举为会长，归国后，任格致书院校长，不久病故。

邓荫南：开平人，原名松荫，檀香山侨商，1895年起义时，曾变卖家产资助革命，并积极参与1900年之役，失败后在香港开辟农场。民国后曾任东莞、开平县长，民国11年病故。

唐 雄：中山县人，年少时与国父在檀香山同砚，在香港时受洗，后来在檀香山开设新昌米店、创办华美银行，民国成立后返回家乡。

左斗山：番禺人，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司理，耳聋。孙中山初在粤行医就挂牌于此。1895年起事的文件多放于此，失败后被捕，后被保释。

史坚如：番禺人，原名文纬，澳门格致书院学生，1900年与孙中山、邓荫南计划攻打广州，惠州起义时，他计划炸死督抚德寿，失败，被捕牺牲。

何 启：南海人，雅丽氏医院是为纪念他的亡妻而设，1895年之役，对外宣传及起草英文宣言皆出于他手。

黄 福：番禺人，1900年助史坚如轰炸督抚，民国6年，帮助邓荫南编练民军，后被李耀汉捕杀。

毛文敏：广东连县人，后改名文明，传教士，史坚如曾利用他的地方储存炸药，辛亥后任广东财政司长、连县县长。

梁慕光：广东博罗人，1900年、1902年起义参与者，同盟会员，民国后返粤任税务征收局员。

王质甫：花县人，圣教书楼内礼拜堂牧师，1895年因为帮助党人收藏军械亡命日本，归国后，因于官场中人往来密切，人多疏之。

苏卓南：番禺人，与史坚如、练达成一起参与炸督抚一事，后曾协助郑贯公办《世界公益报》，其后改营商业。

胡心澄 胡心泉：广东人，兄弟，帮助史坚如行事，民国后，胡心泉曾任美国纽约国民党分会会长。

翟美徒：德国某洋行书记，与陈少白相识，陈少白赴香港主持《中国日报》后，由他主持中和堂堂务。

李卓生 关国义：东京的大同学校强迫学生向孔子行拜跪礼，于是耶稣教徒赵明乐、赵峰琴、李卓生、关国义等创办横滨华侨学校，与大同学校抗衡，使众人不为保皇派所惑。

周天霖 周耀初：加拿大《华英日报》创始人，通过宣传福音开通民智，是加拿大革命报刊之嚆矢。

邓干隆：广东新宁人，致公堂干事。

伍于衍：广东新宁人，《中西日报》编辑，1903年孙中山在美国时受其资助。

雷清学：广东新宁人，商人，1903年冬，帮助孙中山筹饷。

刘 柏：广东新宁人，1903年冬，帮助孙中山筹饷。

尤裕堂：顺德人，博济医院学生。

廖翼鹏：惠州人，博济医院学生。

尹文楷：南海人，区凤犀女婿，孙中山开设东西药局时是主治医师之一。

黄康衢：广东人，医生

黄守南：广东人，1900年练达成曾假其地收藏炸药，

吴杰模：福建人，医生。

关心焉：南海人，雅丽氏医学院学生。

郑汉淇：福建人，雅丽氏医学院学生，1911年加入同盟会。

江英华：新安人，雅丽氏医学院学生。

王煜初：东莞人，王宠惠之父，香港道济会堂宣讲师，孙中山经常听其讲道。

宋居仁：香山人，1895年回国参加广州9月起义，其后随邓荫南等奔走两粤，宣传革命。

威利士：英国人，卑涉书馆校长，孙中山信奉基督受他影响不少。

菅原传：日本人，孙中山在檀香山时结识。

何汝铭：香山人，字星俦，香港保罗书院院长，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友谊甚笃。

宋嘉树：琼洲人，号跃如，宋子文之父。多次以多种方式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宋少东：满人，参与史坚如炸督抚一事。

宋玉臣：满人，参与史坚如炸督抚一事。

刘锦州：广东人，参与史坚如炸督抚一事，后从事传教事业。

刘玉岐：广东人，参与大明顺天国起义。

何 萌：广东人，参与大明顺天国起义。

叶木容：广东人，参与大明顺天国起义，被捕后被判监禁二十年，病逝狱中。

钱宝仁：江苏丹徒人，字允生，因苏报案入狱，审讯后被开释。

廖得山：开平人，博济医院学生。

梁乾初：开平人，博济医院学生。

李植生：广东博罗人，精于化工，善制作各种炸药，1900年、1902年之役参与其中。

赵明乐：新会人，1895年失败后孙中山往日本，与之结识。

赵峰琴：新会人，横滨兴中会书记，组织华侨学校，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同学校抗衡。

张 果：香山人，字能之，横滨华侨，与孙中山有家谊。

苏复初：广东人，圣教书楼的大观光书楼司事，他在书楼内陈列新学书籍，结识很多革命志士。

练达成：番禺人，与史坚如合伙计划炸督抚，帮助运送炸药，后以行医为业。

冯活泉：广东人，革命报刊《世界公益报》股东之一。

谭民三：广东香山人，《世界公益报》出版时任司事。

关 贵：东京大同学校学生，与赵峰琴等创办华侨学校，与大同学校抗衡。

林 护：《世界公益报》出资者。

陈卓南：仰光基督教会牧师，同盟会会员，善于演讲。

司徒南达：广东人，传教士，1903年孙中山在美受其资助。

劳培、李炳辉、韦树淮、韦树模、韦统铃、韦容初六人是黄花岗起义死难的烈士中有名可查的教徒。

黄大汉：不祥。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曾对他说过“党中大势已去，尔须再出为国效力。我地系教会中人，做事要有毅力，不可灰心”。

沈纒云：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

徐 谦：1917年起支持孙中山，是孙中山晚年的重要助手。

胡厚斋：不祥。

主要参考文献

-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中、下 上海书店印行 1982年版
-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
-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 冯自由：《革命逸史》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 郭卫东：《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 洪丝丝：《辛亥革命与华侨》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天道书楼
- 罗秉祥，万俊人：《宗教与道德之关系》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钱时锡：《科学与宗教》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 钱钟书：《万国公报文选》 三联书店 1998年版
- 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年版
- 孙文：《建国方略》 上海民智出版社
- 唐逸：《基督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 王以培：《基督与解脱》 作家出版社 1997 年版
-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卓新平：《基督宗教论》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 《孙中山全集》 中华书局
- 《万国公报》 (1874-1907)
- 《 THE CHINESE RECORDER》 (1870-1915)
-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 《近代史资料》 第 71 期
- 《辛亥革命》：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 《华侨与辛亥革命》：近代史资料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12 月版
- 《辛亥首义回忆录》：1—4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版

致 谢

时光荏苒，望着这一沓文稿，在它将要付梓之际，我有太多的感谢要对给予它关心的人讲。

师恩难忘！首先要感谢导师刘天路教授，从论文的选题、资料收集，到篇章结构的布局直至论文的最终付梓，字里行间都凝聚着导师的几多心血；在读研究生的这三年中，刘老师的博学才识、诚恳宽容、淡泊名利，使涉世未深的我获益匪浅；这三年中，在我成长的各个方面，刘老师也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对刘老师的感激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表达的，我想我唯有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才能不辜负刘老师对我的教诲和期望，也才能表达我对刘老师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特别感谢胡卫清教授，在论文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胡老师慷慨的提供了这项研究所需的《万国公报》和其它一些中文资料；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胡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对胡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攻读学位期间，历史文化学院的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也使我受益终生。

同专业的各位同学和三位室友，在学习上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此也向他（她）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在生活和学习上，所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2004年4月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参与编写《近代山东大事记》（待版），发表论文《一战期间山东华工在欧洲》、《“山东问题”与华盛顿会议》。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论文评阅人	姓 名		专业技术职务	所 在 单 位		对论文总体评价*		
答辩委员会成员	姓 名		专业技术职务	所 在 单 位		备 注		
	主席							
	委 员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 总体评价*				答辩秘书		答辩日期		
备注								

※ 优秀为“A”；良好为“B”；合格为“C”；不合格为“D”。